

## 由《力报》副刊看抗战时期的湖南现代文学

赖斯捷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 《力报》副刊是抗战时期湖南现代文学的主要传播阵地。通过对《力报》副刊的考察,这一时期湖南文学发展的特征逐渐显现:一是借助外力作用,实现对本地文学发展的丰富、扩容;二是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占据主流;三是大量知名作家加盟副刊的撰稿队伍,成为提升湖南现代文学质量的最主要力量。

**[关键词]** 《力报》副刊; 抗战时期; 湖南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4-0095-04

1936年9月15日,抗战时期湖南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民办日报《力报》在长沙创刊。这份日报,创办初期的人事关系有些复杂:担任该报董事、社长、主管报纸经营问题的蒋肇周、雷锡玲、刘腴深等人,属于蒋介石的黄埔系;负责业务的总编辑康德、副刊编辑严怪愚、新闻编辑陈楚等人则与中共地下党员暗中交好,思想趋于进步。两派立于不同阵地的人员,共同经营一份日报,造成《力报》在创立之后,经常是这边为蒋介石祝寿,那边替鲁迅默哀,反动与进步交织构成该报的版面特色。但是,这种互为对立的局面,在《力报》的副刊上,却没有出现过,严怪愚的进步立场,促使副刊向新文学敞开了大门。

至1948年11月19日停刊,《力报》曾先后在长沙、衡阳、邵阳、沅陵等地出版,抗战末期,衡阳《力报》曾迁往贵阳出版。无论在何地编辑,《力报》副刊的进步立场始终没有改变过。谢冰莹、端木蕻良、穆木天、艾青、茅盾、郭沫若、赵景深、田汉、卞之琳、夏衍、臧克家、何其芳、聂绀弩、胡风、蹇先艾、巴金、蒋牧良等人先后有文章见于该报副刊,端木蕻良更是从1943年5月开始担任衡阳《力报》副刊《文艺新地》主编直到次年7月。正是基于此,笔者选择《力报》副刊为视角,来进入抗战时期的湖南现代文学。通过对《力报》副刊的考察,抗战时期湖南现代文学发展的特点逐渐显现。

借助外力作用,实现对本地文学发展的丰富、扩容,是这一时期湖南文学发展呈现的第一个显著特征。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东北、华北等沦陷区的知识青年陆续流亡到了湖南,他们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亲历沧桑之痛的各种复杂心情,在《力报》副刊的关注之下,这股处于流亡状态中的文学势力,成为丰富湖南文坛创作主题、创作风格的重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一曲流亡者之歌,从精神层面冲击了远离战场的湖南民众那种安逸心理,从而在思

想上丰富了他们对现实、对战争的清醒认识。

湖南,偏在中原的南部,距东北数千里,东北同胞怎样受苦,湖南人不知道,东北同胞怎样受辱,湖南人不知道。

这里,有几个东北青年,他们由鞭打中,镣铐中逃了出来,到湖南这温柔的境界,看着湖南人民湖南青年这种安静的生活,这种醉生梦死的态度,便想到自己的已经沦亡的故国,回忆到自己过去那美丽的生活,他们忍不住痛哭了,……

他们呐喊,他们痛伤地在呐喊!<sup>[1]</sup>

《力报》副刊将他们的呐喊汇集起来,编辑而成三期“东北青年的呐喊”特辑,于1936年11月8日,10日,11日陆续在《力报》第七版刊载。这三期特辑,代表着战争亲历者的心声,他们的文字,成为副刊反映战争的作品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这些东北青年亲眼见过自己家乡被铁蹄蹂躏过后的惨状,亲身体验了有家不能归的茫然无助,这种生命体验,于东北青年作家而言是独有的。因而在他们的笔下,沦陷区人们内心的情感体验是表现的重点。其中《哈尔滨的冬天》对东北沦陷区普通民众心里那种绝望、无助刻画得尤其感人。

冷。

北国的深冬,老是刮着大风,尖锐而有旋律的声浪,自远而近的袭来,刺进耳鼓,刺进心扉,使每个人的灵魂都在战栗,恐惧,不能安静。创伤的铁格条,把天空完全划成方块,可惜这些方块的颜色全是灰暗,乌黑,乌黑得像烟囱里喷出来的黑烟,永远黏在天空,浓得化不开。我们的心情变得窄狭,烦闷,焦躁——我们在这种环境下消磨着生命。……<sup>[2]</sup>

这篇小说,文字间没有包含哪怕一丝光亮,监牢中的“我”也看不到任何希望。绝望,无疑是人生最大的悲哀。而它是这么自然的就流露在了一个东北青年的笔下,可以想见这曲流亡者之歌哀痛之深。

在此特辑推出之前,《力报》副刊所刊载这类作品直接描绘

**[收稿日期]** 2008-04-13

**[作者简介]** 赖斯捷(1979-),女,湖南祁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战争创伤的作品并不多见,甚至连战争本身也较少涉及。不过,战争毕竟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对于副刊的影响,不仅造成了外地文学势力流亡至湖南,其本身更是成为推动湖南文学转向的直接推手。七七事变之后,战事迅速扩大,此时的湖南也不再偏安一隅,反映在文学领域,《力报》副刊于此时相继推出“抗战专辑”、“湖南妇女抗敌旬刊”,并在1937年9月4日将副刊更名为“火炬”,这标志副刊的创作正式转入以“抗战”、“救亡”为主。

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占据主流,是这一时期湖南现代文学发展呈现的第二个显著特征。

做文章全凭空想,真是不高明的!……从事文学的人,便不得不去多过几种异味的的生活,寻点他人所不能受得到的刺激尝尝,然后写。……好的作品,绝对不是完全幻想。……无论如何,文学应该多多的写实……<sup>[3]</sup>

文学的描写是需要简单明了而有力的文学形式,来反映现实,批评现实,这是每个作家应当考虑的事情。<sup>[4]</sup>

文艺是反映现实的,同时也是时代的前驱,有了怎样的现实,自应有怎样的反映。……<sup>[5]</sup>

《力报》副刊上类似的文学主张不在少数,他们的观点无一例外均着重“现实”二字。不过在“反映怎样的现实”这方面,副刊在七七事变前后,给出的却是不同的答案。

1936年发表在本报副刊上的中篇小说《雾》,讲述革命中经常出现的有关出卖者与被出卖者的故事。定生、老徐是革命队伍中的同志,然而老徐却出卖了定生和其他十几个同志,背叛的原因仅仅是为了两人同时喜欢着的碧茵选择的是定生而不是他。文章并没有正面描写革命者的革命活动,而是将大部分笔墨放在定生被捕后牺牲前的牢狱生活,通过碧茵每天的探监,来展现两人坚定真诚的爱情,其间穿插大量心理描写,且人物的心理变化成为推动整个故事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反面形象出现的老徐,却也不是无情无义之人,在出卖与否上他也曾经动摇过,然而最终并肩革命的情谊没能战胜失落了爱情的嫉妒。另一方面,以正面形象示人的定生,却也不是毫无畏惧的超人。他有挂念,他会胆怯,除了革命,他还有七情六欲。

《雾》的结尾处定生的被枪杀,提醒我们这是一篇涉及革命题材的作品。然而,如果忽略这一点,我们会发现,透过《雾》,展现在眼前的是爱情的美与丑和人性的善与恶。老徐的出卖,仅仅只是由于个人爱情的失败,与贪生怕死等传统意义上的叛徒不同,这是一种泄私愤的背叛,是不能容忍的。然而生活中得着机会就向不满者报复的泄私愤行为,却又是人性中无法克服、避免的。作者只不过将它放在革命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以加重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换言之,革命在这篇小说中,只是情节展开的需要,而不是作者的写作目的所在。对“革命”这一元素做如此处理,与当时左翼文学中流行的革命浪漫主义显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如果仔细辨别,不难看出《雾》对革命背景下复杂人性的探索,是沿着“五四”运动以“启蒙”为责任的现实主义风格这条道路而来。

以“启蒙”为己任的现实主义风格一经确立,在选择怎样的启蒙对象方面,副刊再一次体现出对客观现实的尊重。作

为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内陆省份,“农民”当仁不让地成为湖南本地文学势力的首要启蒙对象。

王琦蔚的《东林》,写了农民东林为了给生病的妻子筹钱买药,不得已去偷了乡绅的几根毛竹,然而却被乡绅的走狗发现的故事。在地上抽缩、颤栗着的东林,其形象一点也不高大,但在湖南却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农民形象。经历过大革命失败后的残酷清洗,湖南的普通农民已经变得非常脆弱了:今天打土豪分劣绅的,很有可能在明天被冠上“反革命”的头衔推上刑场,为了保命,本就胆小的农民更加变得不敢越雷池半步。

谢冰莹的《毛知事》则描绘了一个“过了一生的太平日子,没有哭过,没有急过”,也“不知道忧愁是什么,快乐是什么,痛苦又是什么”的人物。即便是遇见革命这翻天覆地的运动,毛知事这一类人也只是骂:“娘卖××,×军来了,他们要打土豪,分田地,土豪是什么娘卖×的,我不懂,只有分田地,如果是真的,那倒很好,哈哈,以后再不愁没饭吃了。”<sup>[6]</sup>该文发表时,副刊编辑曾在正文之前加了一个“介绍文学”,指出农村中到处布满“毛知事”这种人物,他们愚蠢,憨直,不肯妥协,什么都凭自己那一点小情感去批判,然而他们勇敢,赋予反抗情绪,始终不失为社会中一种好人。毛知事这一类型的农民,是一类在阶级问题上单纯得近乎无知的普通人,他们不关心谁当家谁作主,只要能不愁没饭吃就好,就欢迎。虽然他们并不高尚,更谈不上什么觉悟,但他们却是在当时农村分布极为广泛的,把他们真实的再现于小说中,符合当时湖南农村的真实情况。

从人鱼速的《阿Q二世旅行记的一页》,虚构了阿Q与一位未庄的女性(不是吴妈)的恋爱结晶“二世”回赵府为父讨公道的故事。另一篇小说《海外奇方》,写已逾四十岁的科发夫妻为了给一岁的独苗治肺病,听信村中妇人的传言,跑去找一所谓洋人菩萨,希望能救孩子性命。

早饭后,八点钟的光景,月娥和佑福婶早已在科发嫂家里集合。特别是佑福婶,昨夜简直一夜没睡。这里看看,那里摸摸,用艾叶水洗过澡,今早还是吃素。科发嫂也是吃的素,不过只是用艾叶水洗洗手,替孩子擦了脸。<sup>[7]</sup>

然而妇女们的虔诚,却没能让洋人菩萨赐予的海外奇方救活科发家的孩子,“过年了,只有科发哥家的大门仍是冷静的闭着,断续地从寒风里传出了科发嫂的哭声。再没有孩子的咳嗽。”这情节,颇能让人联想到鲁迅的《药》,科发夫妻的愚昧、迷信一如华家,只是那西洋来的无用菩萨显示出的却是湖南人内心深处对西方文明的某种不信任。

副刊这种对“五四”启蒙主题的自觉呼应,证明了当时的湖南,在现实发展上仍然停留在“五四”阶段,本地文坛所接收的主张、所汲取的营养,多来自20年前的那场运动。副刊恰是因为忠实于湖南的这种现实状况,而自觉放弃了当时全国文坛流行的左翼文学中那些革命英雄主义的浪漫情怀。

不过,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这种以“启蒙”为主题反映农村现实的作品逐渐退出了版面,随之而起的是以现实抗战为反映对象的作品。七七事变之后,副刊风格明显为之一变。首先是在1937年9月4日将副刊定名为“火炬”,至当月

17日，“火炬”上的文字全都是围绕“抗日文学”而展开。十余天的时间里，“火炬”共发表讨论文章13篇，为抗日文学在副刊上的发展造势。这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各式各样的抗战文学成为占据副刊版面的主要文字。这部分文字着眼于战争本身，枪火、炮弹、飞机、硝烟、战士等是作品中常常出现的标识。由于风格过分雷同，许多作者又缺乏自身体验，口号式的激情宣泄过多，作品因之显得干瘪、生硬。副刊作品质量的提升，有待于另一股力量。

大量知名作家加盟副刊的撰稿队伍，成为提升湖南现代文学质量的最主要力量，是这一时期湖南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三个显著特征。

在《力报》副刊存在的12年间，其版面上先后留下许多大牌作家的名字。郭沫若在《人民的文艺》中高呼“今天是人民的世纪，我们所需要的文艺也当然是人民的文艺。文艺从它滥觞的一天起本来就是人民的，……它们是被集体创作，集体接受，集体享有”。对于庙堂文艺，郭沫若指出，它是“牺牲大众的幸福以供少数人的享乐为使命”，因此必将“僵死下去”。人民的文艺，“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艺，……是大众化，现实主义，民族的同时又是国际主义的文艺”，因此，“它不容许我们采取排他的态度，但也不容许我们宽容别人的排他的态度。它和一切变相的帝王思想，个人主义，法西斯主义，侵略主义，等等是完全绝缘的。”<sup>[8]</sup>而在另一篇《“亚洲苏联”序》中，则更是体现出他此时的政治立场。

而从胡风在《关于“善意的第三人”》直率地表示“知识分子就一直没有脱出帮忙或帮闲地身份，也即是一直没有成为‘第三种人’”<sup>[9]</sup>这一论调，可以看出，此时的他思维的某一部分仍然被“第三种人”的争论所羁绊。

茅盾在《森林中的绅士》一文中，介绍了“据说在北美洲的森林中有一种得天独厚的野兽，这便是豪猪。这是‘森林中的绅士’。豪猪浑身长满长刺，是它的‘绝妙自卫武器’。然而，具有这样武器的豪猪，怎么‘慢慢有绝种之忧呢？还是因为它‘得天独厚’之处存在着绝大的矛盾，……结果仍然于它不利呢？”<sup>[10]</sup>显然，这篇文章应当是在暗讽那些以绅士自居，对国民党存在诸多幻想的知识分子。

其他如何其芳的《饥饿》、《“清明前后”的现实意义》；巴金的译作《艺术家》；梁实秋的《书法的前途》；蹇先艾的小说《盯梢》；聂绀弩的《哪吒——小说人物杂忆》、《申公豹——小说人物杂忆》；欧阳倩予的《啊！是梦》；田汉的《关于平剧的改良》、《发扬“春秋精神”》；俞平伯的《一个熟悉的故事——〈困兽记〉读后感》；茅盾的《民营出版业的呼愿》、《读宋霖的小说〈滩〉》、《〈时间的记录〉后记》；卞之琳的《“女人变狐狸”》；蒋牧良的小说《父与女》等都是这段时间内陆续在《力报》副刊上发表的。

在诸多将名字留在《力报》副刊版面上的作家中，有一个独特的存在——端木蕻良。这位曾担任衡阳《力报》副刊“文艺新地”的编辑，在《力报》迁回长沙刊行副刊“草原”后，以作家身份继续活跃其上。

一个奇异的咖啡店，在昏黄的灯光底下微笑着，挺直的

地板，刚刚铺满了劣质得地腊，没有人在打弹子，只有白色的围裙，煤气灯晕黄得灯光……流浪的人一走过这个屋子，两只耳朵就会热烘烘的再不见那呼呼的风声，再不见那凄凉的鸟叫而眼睛里冷冷的看见了那红洞洞的情景，黄龙龙的光，疲倦的身上暖和了，紫色的血管从紧张的肌肉里突现出来，多么奇异，咖啡仿佛在壶嘴里呼啸，姑且喝一杯吧，深色的带着香味的果汁，好像深海里面的鱼，自己用鳞片闪出些微弱的光，引诱水里的小虫子，伸处苍白的手，也许带着鳞片的手，在一只玻璃杯里咬嚼那咖啡豆的香味。……

有那么一幅画，是多么有意思，遥远说着封建时代的最后一种浪漫主义的酒店间的情调，这种调子逐渐的在人们的眼前褪色了。那种恍惚的迷离的感伤的日子也被另外一种日子来代替了。

从这小小的画面上像一条丝线牵引着飘荡的纸鸢，像记忆似的露出幻想，我永远和谷河生活在一起。<sup>[11]</sup>

《小小的画面》是“草原”上一篇非常另类的作品，奇异的咖啡店，朱红的地板，肥胖的老板娘，浮肿的酒鬼，隔壁的钟表店，街头卖唱的罗马人，金发美人，伯爵，谷河的画，这些意象的堆叠，为我们营造出一种属于中世纪欧洲贵族的悠闲懒散的气质。出没于咖啡店周围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是无聊而空虚的。端木蕻良知道，这里所有的人、物、事都是已经或即将逝去的，然而即使这样，他仍然毫不掩饰自己对“那种恍惚的迷离的感伤的日子”的留恋和沉迷。他的其他作品，如《他》、《余哀曲》等，也均是抒写个人情感，丝毫不涉及抗战现实。抗战年代里，当大部分作家都将满腔的热情、满腹的文采献给人民时，端木蕻良却沉静在自己的小小画面中，诉说自我的内心私语。这种个人化的写作，与同时期活跃于《力报》副刊上的其他作家相比，显得格外另类，因而也更令人印象深刻。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的湖南现代文学，在《力报》副刊的支持下，得到了迅速发展。1936年11月，《力报》副刊陆续推出三期“东北青年的呐喊”特辑。这一事件，标志着外来文学力量开始正式走入湖南文坛。此后的《文艺新地》，更是鲜明体现出融合的特征。这种融合，第一当然是表现在外地作者在数量上的增加；第二是统一在现实主义旗帜之下各地风格的杂糅；第三则是抗日情感的集体表达与私人体验的个性化表达之间的交相辉映。这一时期，由于战乱，给《力报》副刊带来了许多知名作家。他们的到来，有力地推动了湖南本地文学的发展。

然而，这些在《力报》副刊版面上流转的成名作家，最终仍然没能从根本上促进湖南现代文学的飞跃。这是因为，首先，战争年代里作家多处于一种居无定所的流浪状态，造成副刊的稿源不能得到稳定、持续的保证。其二，生活在不安定状态下的作家，无法全身心的投入创作，因而供给副刊的稿件，都是短篇，且具有较大随意性，质量也因此打了折扣。其三，报纸本身版面的限制，也决定了《力报》副刊难以承载大容量的长篇巨制。其四，“在我们湖南一省之地，要办一个这样大规模的副刊，在事实上却有着很多的困难。第一，我们自己的能力有限，不能完全负起这整个的重担。第二，本

报的报酬不丰,买不到名贵的稿件。第三,以友谊的关系,请专门学者写稿,可一而不可再,难以持久。第四,有些专门学者,纵令请他写稿,但他也许懒于执笔。……”<sup>[12]</sup>编辑的这番话,明确地点出了身为地方媒体的《力报》副刊在地域上受到的局限。的确如他所说,许多知名作家的名字,在副刊上不过昙花一现,撑撑门面还行,果真要靠他们的稿件来支撑起日常运作的话,《力报》副刊还没有能够获得这种优待。

[参考文献]

[1] 怪愚.前言,“东北青年的呐喊”特辑,1936-11-08.

[2] 陈歌芳.哈尔滨的冬天,“东北青年的呐喊”[N].力报,特辑第1号,1936-11-08-11-11.

[3] 十三郎.经验文学[N].力报,1936-10-17.

[4] 何新.报告文学[N].力报,1936-11-15.

[5] 晓堂.民族文艺试论[N].力报,1937-04-02.

[6] 冰莹.毛知事[N].力报,1937-01-29-02-03.

[7] 佚名.海外奇方[N].赫曦旬刊,力报,1937-03-26.

[8] 郭沫若.人民的文艺[N].力报,1945-05-21.

[9] 胡风.关于“善意的第三种人”[N].力报,1945-08-18.

[10] 茅盾.“森林中的绅士”[N].力报,1946-02-18.

[11] 端木蕻良.小小的画面[N].力报,1946-04-28.

[12] 发刊宣言[N].力报,1936-09-15.

## To Understand Huna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rough Supplement of “The Force Reports”

LAI Si - ji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supplement of “the force reports” is the main media for Huna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s spreading. Through observation we can clearly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na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irst, the local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as enriched through the outside force; second, realistic style was the main style of works; finally, famous authors were the main force which advanced Huna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s quality.

**Key words:** supplement of “the force report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Huna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上接第 54 页)

## Research on The Index System of Finance Core Competence in Universities

ZHENG Huai - miao, YANG Qiu - li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by introducing the theory of the finance core competence, this paper research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mpositional elements of the finance core competence, and designed the index system for evaluating the finance core competence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finance activity ability, finance management ability, and finance expression ability.

**Key words:** Finance Core Competence;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The Index System